

【史学新说】

□顾则徐

广州有一个并非学界而研究近现代军史的人群,机关、事业、企业人员,也有自由作家,他们的研究大多围绕黄埔军校题目进行延伸,以陈予欢先生为代表。陈予欢先生的代表作有《黄埔军校将帅录》、《陆军大学将帅录》、《保定军校将帅录》、《云南讲武堂将帅录》及黄埔军校1-4期生名录系列研究等,他的研究是基础性的,从资料搜集和整理来说,达到了中国最高学术水准。

一次与陈予欢等先生相聚,他们对我的关于政治的军事、军事的政治区分很赞赏,以为解开了长期困惑的一个军史难题。这个困惑,其实在中国是普遍的,从军史研究者到普通军事爱好者的同时,也领略了我国美食文化的丰富多彩。

【美食溯源】

□戴永夏

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中央台播出后,在全国各地大受欢迎,也引起了人们对美食的关注。该片介绍了我国许多地方的美食风俗,让人们在大饱眼福的同时,也领略了我国美食文化的丰富多彩。我国是一个美食大国,不但各地都有特色美食,历朝历代也都有优良的美食传统。尤其在经济、文化比较繁荣的唐朝,人们的生活比较安定,餐桌上也比较丰富。仅就主食而言,就对舌尖充满诱惑。

唐朝人的主食,主要是饼和饭。这二者中,饼又占据主要地位。唐代赵璘在《因话录》中说,当时“世重饼啖”,这是多数唐朝人食饼的真实反映。

唐代所说的饼,内容比今天宽泛得多。除面糊以外的各种成形面食,都可以称为饼。而唐人食之最多、最具代表性的饼,有胡饼、蒸饼和汤饼等。

胡饼是用烤炉烤制的大饼,它是汉代自西域传入,在唐代极为流行。据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开成六年正月六日(应为会昌元年,即公元841年)立春,命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依然。”这是说在立春这一天,唐武宗李炎向文武百官赏赐胡饼,而普通百姓也都喜欢吃这种食品。正因如此,卖胡饼的人在当时也颇受重视。《延尉决事》中就记了这样一件事:唐代一个叫张桂的人,因卖胡饼出了名,竟被封为兰台令,成为“炊而优则仕”的一个典型代表!

胡饼中有一种胡麻饼,烤制时在饼上撒了一层芝麻。白居易在《寄胡麻饼与杨万州》一诗中曾对胡麻饼赞美道:“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出新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白居易写这首诗时,正在四川忠州做官。他说忠州的胡麻饼完全是按京都长安的方法烤制的,吃起来又香又脆。他派人把刚烤出的胡麻饼送给万州刺史杨敬之,让他品尝一下是不是跟京师最有名的辅兴坊烤的饼一模一样。短短四句诗,就把胡麻饼的风味特点及受欢迎程

政治的军事与军事的政治

坐在深宫的秦始皇、汉武帝无论其统治时期的武功如何赫赫,他们都不是军事家,他们只是政治的军事,而率军远征的亚历山大、恺撒则是军事家,他们是军事的政治。

在一起,尤其是政治家,往往也是军事活动的决策者乃至战略指挥者,而军事家也常常是政治家,因而政治与军事的界限就混淆不清;二是即使近代以前,政治家与军事家的身份界限也往往是非常模糊的。有这样两个原因,军事活动就很容易被作非专业化的理解。如果搞清楚政治的军事和军事的政治,再来看军史,就比较容易进行分辨了。

当人类进入到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文明社会阶段,军事就成为人类最早成熟的专业之一。在中国,至少在西周,已经基本区分文、武官员,战国则出现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专门军事理论。人类文明由战争而生,国家由战争而存灭,所以军事活动必须要由专门化而强、而胜。但是,武人由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往往并不占据文化的主要话语权,因此,军史叙述多由文人承担,从而多有偏见。比如,以

明朝戚继光为例,他是一名自己进行著述的军事家,有《练兵纪实》、《武备新书》等多部专门军事学著作,但在史学乃至军史的叙述中,文人们基本还是从政治、经济、战略的角度去描述他的事迹,而很少从军事技术、战术角度去解剖他的历史活动,也即对作为武人的戚继光进行的多是非军事专业化解读。

战争的发动、展开和结束通常由政治家设计、决策和主导,政治家们把战争作为自己值得炫耀的政绩,似乎,政治家们都成了军事家,即使他可能连枪也不会开。从二战言,希特勒、斯大林当时都被宣称 为军事家,那么,丘吉尔、罗斯福就不是军事家吗?有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甚至连兵也没有当过,跟大规模战争也没有什么关系。以这样的认识,二战后历任美国总统基本都与战争有关,他们是否更应该是大军事家了?政治的军事的边

际被热情放大,从而政治与军事的界限空前模糊,军事作为一种专业被极大曲解,几乎完全混同为政治及其战略。

只有弄清楚了政治的军事与军事本身的区别,对军史才能有恰当的辨别。军事是技术,是对抗行动本身,是单兵、带兵、练兵和作战,军事家只能是带兵出身并指挥作战的将领。发动战争,要求占领哪个地区,诚然是军事,但主要是政治家的事情,是政治的军事。没有带过兵,没有过冒着枪弹冲锋,不懂战术、编制、装备、配制、工事、地理、后勤、阵形组织、战线组织、条例、命令等,不是什么军事家。如果看古代人物也许容易明晰,坐在深宫的秦始皇、汉武帝无论其统治时期的武功如何赫赫,他们都不是军事家,他们只是政治的军事,而率军远征的亚历山大、恺撒则是军事家,他们是军事的政治。

(本文作者为独立学者)

舌尖上的唐朝

唐朝人的主食,主要是饼和饭。这二者中,饼又占据主要地位。唐代赵璘在《因话录》中说,当时“世重饼啖”,这是多数唐朝人食饼的真实反映。



度生动地写了出来。

还有一种叫“古楼子”的胡饼,《唐语林》中介绍说:“时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层布于巨胡饼,隔中以椒、豉,润以酥,入炉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为‘古楼子’。”显然,这是一种加了羊肉馅的大胡饼,夹层中还放了花椒、豆豉等作料,表面上涂着油脂,吃起来又酥又香,美味异常。

蒸饼是将面糊发酵后再蒸熟的面食,如馒头、包子等。唐朝人食用的蒸饼种类很多,它既可单用麦面制作,也可掺进各种配料。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说:“蒸饼法,用大例面一升,练猪膏三合。”这里指的就是在白面中掺进猪油制作的蒸饼。各种蒸饼不但是百姓餐桌上常备的食物,也能登上皇家的大雅之堂。白居易在《社日谢赐酒饼状》一文中曾提到“蒙恩赐臣等酒及蒸饼、环饼等”,这说明皇帝赐给大臣的食品,就有蒸饼。

汤饼是下在汤里煮的面食,如面条、面片等。唐朝人食用的汤饼种类也很多,当时的诗人对此也多有吟咏。如“菊花辟恶酒,汤饼茱萸香”(李颀);“鸡省露浓汤饼熟,风池烟暖诏书成”(罗隐)。这都说明当时汤饼在民间颇受欢迎。

唐朝的汤饼中,有一种叫“槐叶冷淘”的冷面,是用槐叶汁和面做成面条,煮熟后再放入凉水中冷却,吃起来又凉爽

又别具风味。杜甫曾在《槐叶冷淘》一诗中写道:“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新面来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资过熟,加餐愁欲无。碧鲜俱照箸,香饭兼苞芦。经齿冷于雪,劝人投此珠。”

诗中,杜甫精要地介绍了“槐叶冷淘”的做法、美丽的颜色及清爽甘美的味道,对其大加赞美。作为唐代的“人民诗人”,杜甫的诗一向反映民意。他对“槐叶冷淘”的喜爱,也体现了百姓的的心声。

饭在唐朝人主食中的地位,虽然略逊于饼,但仍是不可或缺的主力,而在有些地区,它甚至比饼更受青睐。饭是将谷物整粒煮熟而做成的食品。唐朝人食用的饭多种多样,主要有稻米饭、粟米饭、黍米饭等。稻米饭食用的范围最广,尤其在长江以南产稻地区,它一直是最重要的主食。稻米饭配以相应的菜肴,既是人们喜爱的美食,也是诗人寻觅的美好意境。如“香稻熟来秋菜嫩,伴僧餐了听云和”(陆龟蒙);“看炊红米煮白鱼,夜间鸡鸣店家宿”(王建);“早炊香稻待鲈鲙,南诸未明寻钓翁”(许浑)。

诗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从诗中,我们足可以看出稻米饭的价值和它在唐人饮食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粟米饭即小米饭,它的食用范围主要在北方地区,尤其

是农村。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写到在山东登州的所见:“山村县人,餐物粗硬,爱吃盐茶粟饭。”说明那里的农民是以粟米饭为主食。而有些官员招待客人,也用粟米饭。如《朝野金载》中就记载说:“汴州刺史王志愔饮食精粗,对宾下脱粟饭(即粟米饭)。”

当时一些小饭店出售的饭食,也多为粟米饭。如唐朝人康骅在《剧谈录》中就写道:“道中小店始开,以脱粟为餐而卖。”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粟米饭在唐代的普及率也很高。

黍米饭是用大黄米(即黍米,有黏性)煮的饭。由于唐代黍的种植量很大,所以黍米饭也是不少地方的主食。一些诗人在诗中都写到黍米饭,如“厨香吹黍调和酒,窗暖安弦拂拭琴”(白居易);“柴门寂寂黍饭馨,山家烟火春雨晴”(贯休)。从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唐代许多地方食用黍米饭的情况。

唐朝人的主食中,还有胡麻饭、乌米饭以及添加各种配料的什锦饭等。这些丰富的主食各有特点、各具风味,真实地反映了唐朝饮食文化的兴旺发达,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领略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济南出版社编审)

假如让清代铺兵从北京递送一封信到南京,大约需7天。我们现在送信用火车、汽车,还有不及用马的时候,岂非怪事?

10年前,我在一家杂志上发过一篇杂文:《信,走得有多慢》。10年过去了,就我收到的平信而言,它走得依然很慢很慢。

那篇杂文提到如下一件事:2005年6月22日,北京日报社的李编辑在电话中告诉我,寄了两张6月20日的《北京日报》给我,问收到没有。我说还没收到。从那日起,我天天开信箱,看北京寄来的报纸到了没有,

【若有所思】

从平信走得慢想到古代驿站

□王春南

因上面有我一篇小文,我急欲看到这张报纸。等了多少天,没有见到《北京日报》的踪影。直到29日,仍未收到李编辑寄的报纸,于是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请她再寄两张。到了6月30日,报纸姗姗来迟。从邮戳看,这件印刷品走了整整10天(6月21日至30日)。7月10日,我收到了李编辑接到我电话后于6月30日重寄的报纸。我看了北京、南京两地的邮戳,发现这件印刷品的递送仍花了7天时间(7月4日至10日)。

在21世纪的今天,在北京、南京间送一封印刷品要10天时间,速度之慢,真是不可思议。10年后,情况似乎没有随着火车、汽车的大幅提速而有所改变。今年9月6日,齐鲁晚报编辑寄了一张报纸给我,我收到这张报纸已是9月15日。从济南的邮局到我南京家中的邮箱,它走了整整9天。这并非偶然现象。浙江温州读书报社寄给我的信,有时9天到,有时10天到。

每遇这种情况,便不由得想起古代交通落后状况下的公文传递。我这里正好有一份《胡适全集》中的资料。据胡适考证,清代“铺兵递送公文,昼夜须行三百里。由北京经古北口出到(热河)行官,约三百五十里,故用快马递送,一昼夜可到”。假如让清代铺兵从北京递送一封信到南京,大约需7天。我们现在送信用火车、汽车,还有不及用马的时候,岂非怪事?

再往前,南宋的驿站传递公文,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快的“日行四百里”,更快的叫“金字牌急脚递”,“日行五百余里”。民国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中说,宋高宗给岳飞的十二道金牌,就是这种“金字牌”,而且是“高宗亲发,不能尽出自秦桧也”。

更早时代,西汉传递公文,据洪迈《容斋随笔》一书,西汉大将赵充国在金城(今兰州)“上书言先零、罕羌事”。从发出报告,到收到朝廷批复,“首尾才七日”。金城至首都长安1450里,往返共2900里,中间还要经公卿大臣讨论、商定并起草批复、加盖玉玺。办事效率及公文传递速度足以令今天的人们惊叹。

现在邮局传递平信为何这么慢呢?作为局外人,我这样猜测:会不会是由邮局重储蓄业务、轻邮递业务,重快递、轻平信导致的呢?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我在北京工作时,每封来自南京的家信,发出后两天可到我的手中,从未超过两天。我的要求不高,只希望邮局传递平信的速度能恢复到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亦即用两天时间把一封平信从北京送到南京的收信人手中。这个要求应当说不过分吧?

(本文作者为凤凰出版社资深编审)